

龔
鵬
程
主
編

古
典
詩
歌
研
究
叢
刊



鵬程

花
木
蘭
文
化
出
版
社
出
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五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3 冊

漢代楚辭學研究——知識主體的心靈鏡像

吳 旻 旻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代楚辭學研究——知識主體的心靈鏡像／吳旻旻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2+202 面：17×24 公分（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五輯：第3冊）

ISBN 978-986-6528-52-1（精裝）

1. 楚辭 2. 研究考訂 3. 漢賦

820.9202

98000873

ISBN - 978-986-6528-52-1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五輯 第三冊

ISBN：978-986-6528-52-1

漢代楚辭學研究——知識主體的心靈鏡像

作 者 吳旻旻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09年3月

定 價 第五輯 20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電子書
PDF

漢代楚辭學研究——知識主體的心靈鏡像

吳旻旻 著

作者簡介

吳旻旻，臺灣高雄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中正大學中文碩士，臺灣大學中文博士，研究範圍以楚辭、漢賦、文學理論、當代大陸小說、海洋文學為主，著有《香草美人文學傳統》、〈框架、節奏、神化：析論漢代散體賦之美感與意義〉、〈「海／岸」觀點：論臺灣海洋散文的發展性與特質〉等專書及學術論文，現任教於臺大中文系。

提 要

《漢代楚辭學研究——知識主體的心靈鏡像》一書針對漢代這個政治上鞏固一統政權，學術上經學獨領風騷，而文學意識逐漸萌芽的時代，嘗試瞭解「楚辭」對當時的人發生了什麼樣的意義？人們為什麼喜歡楚辭？如何詮釋楚辭？又表現出什麼樣的精神呢？

論文中從三個面向探討「漢代楚辭學」之內涵，包含「情志映照、經世致用、遠離濁世」，「情志映照」指漢代士人對屈原不遇的經驗有深刻的感觸，賈誼、東方朔等人在詮釋屈原的同時投射自我，形成互為主體的批評型態，揚雄、班固、王逸則從道德品鑒的角度對屈原產生褒貶。「經世致用」分析兩漢經學氛圍影響下，士人以經解騷，在辭賦華麗的鍛字練句下表達諷諭勸諫的目的。「遠離濁世」指士人面臨專制體制、君王威權、小人讒害等種種挫折，轉向身軀上的隱逸，以及心靈上的超脫想像，藉由文學創作描寫一個上天入地的想像世界，在其中得到審美的愉悅感受。

總而言之，漢代的楚辭批評家或讀者基本上是「知識份子」這樣一個特定的群體，他們從彼此不遇的情志共感或道德品鑒，到理想的努力、困頓後的遠遊，剛好在楚辭學上完整表現出這樣一群人心靈的掙扎，既有入世的企圖，也有出世的意念，同時摻雜了經學經世致用的理想跟文學美感的體悟興發，形成一系列精彩的心靈鏡像。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漢代楚辭學」的反思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6
第三節 文獻檢討	10
第二章 漢代的政治與文學背景	15
第一節 政治環境的特性	16
甲、政治體制	16
乙、律令案例	22
第二節 知識份子的定位	28
甲、先秦——「士」的自覺	29
乙、西漢——雄心壯志與束縛感	32
丙、東漢——士族政治與節義自許	37
第三節 文學觀念的變遷	41
甲、「文學」名實	42
乙、經學系統	48
第三章 漢代楚辭學之「情志關注」	61
第一節 屈原形象呈現	63
一、受 譖	64
二、流放、沈江	68
第二節 反照自身情志	75
甲、批評家分析	76
一、賈 誼	76
二、東方朔	79
三、董仲舒	80
四、司馬遷	81
五、劉 向	83
六、馮 衍	84
七、寇 榮	86
八、趙 壹	88
乙、批評型態意義	89
第三節 道德才性品鑒	91
甲、批評家分析	92
一、揚 雄	92

二、班 固	96
三、王 逸	101
乙、批評型態意義	104
第四章 漢代楚辭學的「經世致用」	109
第一節 曉合經義	110
甲、《楚辭》與經學	110
乙、早期散論	112
丙、《楚辭章句》	119
一、曉合經義	120
二、比 興	121
三、美刺諷諫	123
四、陰陽讖緯	124
第二節 詩學觀念	125
甲、詩言志	125
乙、「詩可以怨」與「香草美人」	134
第三節 辭賦的教化意涵	140
甲、諷 諫	141
乙、歌 頌	144
丙、理論自覺	147
第五章 漢代楚辭學之「遠離濁世」	151
第一節 遠遁自藏思想	151
甲、對屈原的建議	154
乙、賦篇之隱逸思想	159
第二節 神遊的想像創作	166
甲、屈原的示範	166
乙、賦家的承繼	171
丙、隱逸神遊的意義	175
第三節 僊說、巫俗與神話	177
甲、長生僊說	177
乙、巫俗與神話	182
第六章 結 論	187
重要參考書目	19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漢代楚辭學」的反思

「楚辭學」指的是以「楚辭」為中心所做的各種研究，可是比起「《詩經》學」、「《文選》學」或「紅學」（《紅樓夢》學）等其他「專書學」而言，「楚辭學」的名實問題更為複雜，這點下文將探討，明確界定「楚辭學」的「楚辭」範圍^{〔註1〕}。這裡首先要思考：所謂的「專書學」是什麼樣的一門知識？它處理什麼樣的問題？本文又擬如何切入漢代人士跟「楚辭」的聯繫呢？

當一本專書引起後代熱烈而廣泛地討論，而且已經累積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學者們便在該專書名稱之後加一「學」字，成為「專書學」。一書以學名常見者有《詩經》、《尚書》、《易》、《楚辭》、《文選》、《文心雕龍》、《紅樓夢》、《水滸傳》等等。一般專書學的內容主要為後代的傳注箋疏，包含對該專書進行字詞訓詁、文意解析、主旨討論的各類析述；但是在這一解釋系統之外，只要與該原典有絲毫的沾滯

〔註1〕這裡之所以可以暫時擱下「楚辭」的定義問題，乃是因為不論「楚辭」之概念內涵指涉劉向編輯的《楚辭》十六篇（或王逸《楚辭章句》之十七篇）還是限定屈原作品之「屈賦」，甚至為文體名稱，都有具體對應的文本範圍及屬性。

牽連，也都被攬納於「專書學」的範圍。所以「詩經學」中包含博物學，如孫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宋蔡卞《毛詩名物解》、王應麟《詩地理考》、清洪亮吉《毛詩天文考》、李超孫《詩氏族考》等等，以及文字聲韻學，如明陳第《毛詩古音考》、清顧炎武《詩本音》、陳玉澍《毛詩異文箋》等等；「紅學」更是包羅萬象，廣及食譜、藥單、建築、服飾等等的討論。以「楚辭學」而言，其論述成績也是包羅萬象，語言（音韻、方言、語法）、神話、地域文化、博物（草木）等層面都有學者投入心力研究，對「楚辭」嘗試不同切面的瞭解。是以一般而言，以各種角度、各種方法對該專書本身及相關之任何問題進行探索，都被容納在「專書學」的範圍中。

換言之，研究《詩經》的知識為「詩經學」，研究《楚辭》的知識為「楚辭學」，「專書學」乃是用以統稱這類知識。那麼，「專書學」獨立為一門知識的意義究竟在那裡？難道只是為了稱代這些龐大複雜的研究成果？是否有此必要呢？而且是不是所有專書都足以成立「專書學」？如果不是的話，標準又在那裡？這些確實是值得思考辯證的問題，精確地問應該是指涉：「專書學」如何定義？內涵為何？外延為何？什麼樣的書籍著作足以成立「專書學」？「專書學」具有何種價值？這幾個問題。

由前述對現有專書學的描述可知，所謂的「專書學」是一種學術默契形成的結果，不是先驗的設定，是個「外延」比「內涵」清楚的概念（註2）。也就是先有現成可觀的研究成果，才歸納為專書學，而不是先界定一個概念內涵，然後依循而作出這些研究。可是它的概念外延也是有所爭議的，以「紅學」為例，周汝昌先生認為不是所有跟《紅樓夢》相關的研究都屬「紅學」，必須是專屬《紅樓夢》這部書的問題，如「曹學」、「脂學」等才是正統的「紅學」。他說：

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

〔註2〕 外延、內涵為理則學中定義概念的術語，外延指名詞概念所指示或適用事物的全類，內涵則是該名詞外延所共同而特有的性質。

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註3〕

他批駁其他學者將「紅學」劃歸「小說批評」的主張，強調「專書學」自身獨特的問題。的確，每一獨立的專書學，通常存在特定論題。例如：《詩經》的「淫詩、刪詩」，《尚書》的「今古文」辨疑，《紅樓夢》的作者考證等。「楚辭學」中，也有〈大招〉、〈招魂〉的作者考證，「離騷」篇名釋義，乃至「三閭大夫」的職司等論辯焦點。

因此，特定的爭議性問題確實是「專書學」的重要因素。劉夢溪先生說：

能夠以一書名學，歸根結底還是由作品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就是說，書裡面必須有可以不斷進行深入研究的素材、資料和問題，這是最主要的，捨此則其他理由便無以立足。

〔註4〕

所以要判定任何一本專書是否足以成為「專書學」，並沒有客觀、絕對的規範條件。我們只能從後設角度描述「專書學」的特性是：一、研究成果數量可觀，二、有多種不同的方法以此專書為材料進行研究，三、含有特定學術論題。最後一點與其說是「專書學」外延的狹義界線，不如說是關係一部專書能否成立為「專書學」的判定通例。

但是這樣就足以支持「專書學」成立的意義嗎？龐大的研究結果如果不是為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並不需要獨立為一門知識；而以不同方法所進行的研究，若彼此沒有對話功能，也只需屬於原來學科的領域即可；至於特定的爭議論題，會不會反而限定了「專書學」的發展空間，把一部精彩作品的探討，膠著於某個窠臼中？

因此，「專書學」必要性與價值的肯定，應當是相應於這三點來探討。由最後一點談起，某些專書特殊的成書因緣或流傳過程成就出

〔註3〕 周汝昌〈什麼是紅學〉，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三期。

〔註4〕 劉夢溪《紅學》頁13，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

特定論題，而這些論題學科歸屬的困難，促使「專書學」有成立的必要性，可是光是這些固定論題的探討，只是消極性名稱需求，並不易肯定「專書學」的價值，尚需另外兩方面的積極發展來使得這門知識不會僵化，失去生命力。一是融會不同的研究成果，舉例來說，清代學者投入不少心力在《詩經》的古音擬測上，這些研究成果對於「語言學」跟對於「《詩經》學」的意義是不同的；對語言學家而言，《詩經》是漢語上古音的語料，清代學者的研究有助於現代學者更正確的勾勒上古音原貌。但是對於《詩經》學家而言，擬測出正確的原音可以補充、訂正或證明訓詁上的詮釋觀點，或者重新發現某些經過歷史音變而讀不出來的音韻美感（註5）。所以，提供一個空間讓這些同一中心的研究彼此對話，助益研究的進展，促使別種學科的知識、方法能夠支援詮釋依據，是「專書學」存在的意義之一。

其次，將這些以「專書」為對象的研究成果當作對象，進一步研究，則是「專書學」的另一價值。以「專書」為對象的研究叫做「專書學」，而以「專書學」為對象的研究又是另一層面的問題。好比以「文學」為對象的研究是一回事，如「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可是以「文學史」或「文學批評」為對象所做的研究又是另一回事。因此接下來我們要思考，對於「專書學」的研究，可以有哪些處理方式呢？為使討論更為具體，與本文的主題更密切，以下就以「楚辭學」代入「專書學」概念。

「楚辭學」之研究方向，首先是「楚辭學史」，也就是「專書學史」的方式，將特定時間範圍內的「楚辭」研究成果以「史」的方式鋪展開來：展示有哪些研究的存在及其特性，進而掌握這些研究在歷史時間進程的定位，以及其間的互動、影響軌跡。這是目前「專書學」研究的主要路向，故「《詩經》學」有「《詩經》學史」，「《尚書》學」有「《尚書》學史」，「《楚辭》學」今日也有大陸學者易重廉先生《中

（註5）例如知道「伐木」何以「丁丁」。

國楚辭學史》及李大明先生《漢楚辭學史》等著作。第二種處理方式則是凝聚「楚辭學」實際討論的重心——對作者性格、思想的描述以及作品的詮釋賞析，也就是「文學批評」這一學科的實際範圍，——從「文學批評史」的角度來理解「楚辭學」，衍生新的解釋意義。顏崑陽先生〈漢代「楚辭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一文即是這種研究路向的成功示範。

而在上述這兩種研究路向之外，「楚辭學」有沒有其它的處理方式呢？筆者嘗試了一種新的切入角度：以「楚辭」的「讀者」（批評家）為中心，探討「楚辭」對於他們發生什麼樣的意義？以本文的研究範圍——「漢代楚辭學」來說，筆者關心的重點不在於整理、分析漢代人對於「楚辭」做了哪些研究，如編輯成書的歷程、對屈原生平事蹟的記錄，細數哪些人投入「楚辭」的註解、詮釋、批評等。而是去觀照「楚辭」對於漢代人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他們如何面對這個對象？又在對它的認識跟詮釋過程中表現出哪些特徵與意義？也就是從

「漢人 → 楚辭」 變成 「漢人 ← 楚辭」

從「漢代批評家對於『楚辭』做了什麼？」的詮釋角度轉換成「『楚辭』之於漢代批評家發生了什麼？」以漢代的「楚辭」批評家為主體，掌握他們對於「楚辭」的關注焦點，詮釋他們在「楚辭學」中表現出來的精神。

可是所謂的「讀者」、「批評家」是複雜的多數，如何擔任一個主體呢？首先，「讀者」表示「文本的接受者」，乃相對於「作者」為「文本的創造者」而言；但是「讀者」的概念其實非常抽象，因為我們不可能掌握真正閱讀到該作品的所有人，更無法梳理他們的閱讀感受，相較而言，「批評家」才是有具體指涉對象的詞語。因為研究、討論必須有具體存在的語言實體為依據，因此留下表述意見的批評家方能成為「可知」的讀者。而從實際的批評文本得知，漢代的「楚辭」批

評家們並非參差混亂、毫無交集的群體，而是在階級、社會地位、自我認同上有著大量重疊的特殊族群。他們是受過教育、擁有知識、以政治為職的一群人，也就是知識階層（註6），這樣的特質同時影響著他們面對「楚辭」的特殊情感，以及詮釋「楚辭」的精神表現。所以筆者選擇「知識份子」這一特定的族群立場，來作為漢代「楚辭」讀者的主體，是為知識主體。如此既能在讀者身份上籠括大部份的批評家，且能突顯「楚辭」在漢代所發揮的核心精神。漢代學者面對《楚辭》的態度不是抱持「為學術而學術」的想法詮釋《楚辭》，也不是舞文弄墨的閒暇娛樂，而是因自身對存在時代的現實感受，在前人的文化經驗中找尋共鳴契合，因此他們處理作品的方式也是互動性的。

在這個基礎上，本文不以「時間」跟個別「批評家」為敘述座標，歷敘一個個楚辭學家的成就與貢獻，而企圖以中心意識為主軸，揭示漢代知識份子跟「楚辭」的聯繫，不只是他們對「楚辭」直接的感發與詮釋，還有他們因「楚辭」這一對象而表現出來風格，也就是在「楚辭學」上對自身與時代產生的思考、創造。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文由「專書學」的反省來思索「楚辭學」的研究路向，可是誠如前節第一段所提及，「楚辭學」的名實問題比其他專書學更為複雜。

《楚辭》編訂成為一本書，是西漢劉向（約西元前77至西元前6年）手上才完成的。劉向蒐集、整理成冊的《楚辭》一書，其收錄的篇章及標示的作者分別為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賈誼〈惜

〔註6〕 尤其跟漢代「古詩」、「樂府」比起來，詩歌的民間色彩對比出擔任「楚辭」批評家的辭賦作者們濃厚的文人氣息，由其用字遣辭或描寫內容的強烈「貴遊」色彩觀察得知，辭賦家不只是普通受過教育的知識階層，甚至是學識涵養深厚的學者，或者是接近權勢核心的臣屬。

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註7〕}〈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歎〉，計一十六篇。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屈原作品在其中的重要份量，說《楚辭》一書以屈原作品為主也不為過。後來王逸（約西元 89 至西元 158 年）以之為底本註解成《楚辭章句》，又加上自己的〈九思〉一篇。因為劉向之書已亡佚，故王逸《楚辭章句》十七篇成為「楚辭」書名的篇目共識。

若以「專書」的定義來看，所謂的「楚辭」應該是指稱劉向《楚辭》十六篇，或王逸《楚辭章句》十七篇。可是劉向是西漢宣、元、成帝年間的人，王逸則是東漢和帝至桓帝時人，在他們編輯、註解之前，早有「楚辭」之名，且有許多對這些篇章討論研究的成果。「楚辭」之名始見《史記·酷吏列傳》：「買臣以楚辭與助具幸。」這裡「楚辭」所指並不精確，意思可能是善於詮釋、講解屈原作品，或是能創作與〈離騷〉等作品形式、風格類似的文章。而在太史公之前的賈誼、淮南王，便已作有〈弔屈原賦〉及〈離騷傳〉，投入實際的詮釋、批評中。因此，劉向只是將這些漢人們討論已久的「楚辭」篇章編訂成冊，在這之前，雖然沒有這樣一本書，卻無礙於漢代知識份子對於屈原作品的喜愛與討論風氣。

於是，我們可以假定，漢代人對於「楚辭」的探討並不是建立在《楚辭》成書的依據上。本文所討論「楚辭學」的「楚辭」範圍，也就沒有必要限定在劉向十六篇或王逸十七篇的標準上。而且，筆者再三強調，關注的是：「楚辭」對於漢代知識份子發生什麼樣的意義？因此本文所界定的「楚辭」討論範圍也就應當依漢人實際討論重心來界定，而這個重心正是「屈原其人其文」。其餘如宋玉、景差等人，即使偶有論及，亦不在論題核心；為求論述焦點的集中，筆者不擬處理這部份零碎而且不是非常重要的旁枝素材。至於賈誼至王逸等人諸作，筆者將之安置於「楚辭學」的文本之列，而不是「楚辭」的直接

〔註7〕嚴忌原名莊忌，避帝諱而改稱，沿用至今，故本文以下提及此人皆稱「嚴忌」。

文本。這意思是說，對「楚辭學」而言，「楚辭」是批評的文本依據，但是對「『楚辭學』研究」這個「批評的批評」而言，屈原作品不是直接面對的對象，探討屈原作品如《史記·屈賈列傳》才是文本，而《楚辭章句》中所收錄賈誼至王逸的擬騷，也跟後者一樣，歸屬於「楚辭學」概念之外延，是「『楚辭學』研究」的文本。之所以這樣劃分，乃是筆者認為若將賈誼〈惜誓〉劃歸「楚辭」，同時將其〈弔屈原賦〉判屬「楚辭學」不合於批評過程的實踐。至於「擬騷」何以能擔任「批評」的文本，將於後文說明。

確定本文所擬討論「漢代楚辭學」的「楚辭」範圍為屈原其人其文之後，接下來則是要界定「漢代楚辭學」的文本範圍。以下分「時代斷限」與「論述形式」兩方面說明。

（一）時代斷限

歷史上的漢代實為兩漢之合，西漢始自高祖即位（西元前 206 年），終於王莽登基（西元 9 年），凡二一五年。東漢則起自光武中興（西元 25 年），到曹丕稱天子（西元 220 年），歷時一九六年。政治史的時代斷限是以事件為依據，斬截俐落無所疑義，然而文學上的時間觀念卻無法如此一刀兩斷，因為文學現象與文學傳統的承繼、互動，自有其脈絡，一味配合政治史並不十分恰當。可是在找不到更理想的方式來取代之前，既有的「朝代」觀念對於古典文學研究的時期劃分，依然具有重大的參考意義。除了它簡潔、有共識基礎之外，中國文人跟政教的緊密關連，使得文學歷史的時期劃分往往跟政治史有所對應。因此，折衷的方式，便是以「朝代」為基礎，再依據文學特殊的因緣修正出精確的始末時間點。

本文所擬研究者，乃是屈原創作完成之後，作品引起知識份子熱烈討論，提出正反評價，並以辭賦發揚騷人情志的這段時期，而且是在「文學」觀念明晰之前；基本上和政治史的兩漢相去不遠，是以依然採用「漢代」楚辭學這樣的時代劃分方式。只是對於這個時間段落有幾點補充說明。首先，西漢、東漢之間曾有王莽篡位的十五年間隔，

基於文學歷時連貫性，新莽之世當然含蘊在內。至於前後始點跟末點的切分，本文取捨從嚴，凡生卒年皆在漢世者才列為本文研究範圍。其原因一為「楚辭」對於漢代知識份子的特殊意義跟大一統政局的制約或影響有關，而楚漢相爭與建安時期都不是這樣的氛圍。其次，跨越秦漢之際的學者對於「楚辭」，未見重要論述意見之史料，故無討論價值。其三，建安雖仍屬東漢，但無論政治、社會、學術俱在變動中尋求新貌，曹氏父子領袖文壇，所謂「建安風骨」鮮然標著，漸啓六朝浪漫華采之風，因此建安文士歸於六朝當較劃屬漢代符合文學風氣。

（二）論述形式

一般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楚辭學史論及「漢代楚辭學」時，多強調司馬遷《史記·屈賈列傳》、班固〈離騷贊序〉、王逸《楚辭章句》等幾篇文本而已。原因是它們主題明確，針對屈原其人其文進行陳述與評斷；而且是說明性文字（相對於創作性的賦、擬騷），符合「批評」的要求。這幾篇固然是「漢代楚辭學」中非常重要的代表性文本，可是除此之外，難道沒有更多的文本了嗎？假如從「專書學」的角度來看，所謂「漢代楚辭學」的文本在定義與文字形式上，究竟可以容許怎樣的空間？

漢代關於「楚辭」的文獻基本上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對「楚辭」作者及作品以說明性的文字作旨要的闡述、評論及字句訓解，如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班固〈離騷贊序〉、王逸《楚辭章句》；這類納入「楚辭學」應當沒有爭議性。二是除了形式之外，內容也與「楚辭」相關的擬騷及辭賦文章，如賈誼〈弔屈原賦〉、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歎〉、揚雄〈反離騷〉、班彪〈悼離騷〉、梁竦〈悼離騷〉、應奉〈感騷〉、王逸〈九思〉等。此類則必須加以說明：這些文章雖然不是使用抽象概念陳述的知性語言，但仍對批評對象發出詮釋及評價，具有文學批評的本質，因此也應列入討論文本。第三類雖未直指屈原之名，其文章主旨也不是針對屈原